



本期编辑:刘诗萌 美编:胡健博 校对:胡建安

韩城花椒

田军锋

秦味 韩城花椒色泽鲜亮、粒大肉丰,香气浓郁、味道醇厚,距今已有600多年的栽培历史,具有祛风湿、止牙痛等功效。韩城大红袍花椒犹如一张烫金的名片,被誉为“花椒之王”,名扬四方。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市场的开发,花椒早已不只是灶台边辛香的佐料,而是衍生出花椒油、花椒酸奶、花椒芽菜、花椒锅巴等60多种系列产品,宛如花椒树上结出的“奇异果实”。

花椒是山野的赤子,不择地力,独爱山坡高粱。它没有伟岸主干,由三四根枝条组成,成年树高不过两三米,浑身披挂尖刺——那是它生存的倔强铠甲。每年大地回春,它便悄悄抽出嫩芽,继而开出一簇簇如桂花般细小的绿叶,花落后果实青青。放眼望去,满树绿意像撑开了一把把玲珑小伞。时光流逝,青绿的花椒渐渐染了岁月的斑斑,褪尽青涩,由浅红晕染成深红,终于如繁星点点地缀满枝头。

作为一种经济植物,花椒是农家人生计所托。每年七八月间,当椒香最浓时,晨曦未至,村路便已人影幢幢。男女老少全体出动,提起竹笼,背上布兜,早早下地摘花椒。田间地头成了最热闹的风景。村上大户椒农还要雇请“椒客”相助。晨光微亮,椒农终日围在椒树丛中,直到暮色降临,椒农背着沉甸甸的鲜花椒回家。吃完晚饭,庭院中央便围坐着一家人,在灯光或月色里细细拣取椒叶。随后将花椒均匀铺于地面,接受烈日暴晒。待晒得焦脆干透,再筛去椒籽,最终装袋入仓。这一粒粒红果饱含辛苦,为农家人的日子默默奉献。

这沉甸甸的花椒里包含着农家人的期盼,珍藏着椒农的坚韧与辛劳,支撑起多少农家子弟读书的梦想,又解救了多少困窘的家庭。它的分量,在汗水浸透的竹笼里,在日光暴晒的场院上,更在那些被它托举过、改变了命运的人心底。

2014年,韩城市被命名为“中国花椒之乡”。2016年,国家林业局认定命名韩城花椒产业园区为“国家花椒产业示范园区”,引领全国花椒产业转型升级,带动科技研发创新。2021年,韩城大红袍花椒被纳入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互认互保名录,当年出口额300万元,产品远销日本、韩国、越南、阿联酋及欧盟等国家和地区。

花椒红了,满山挂满红玛瑙。深红的色泽既沉淀着土地的记忆,亦映照出家园在时代中悄然转变的侧影。如同那弯曲的椒枝,默默承载着沉甸甸的果实,也寄托着一片土地无声的变迁与守望。



在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岐山两县的交界处,有一处被称为周原的考古遗址。这里面积达30平方千米,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遗存最丰富的先周、西周时期遗址,也是周原考古领队种建荣倾注半生心血的地方。对种建荣来说,“周原遗址”像一位相识多年的老友。

找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找城都是我们念兹在兹的使命”

“周原”一词,在古代文献中作为周人崛起的都城曾多次出现。据文献记载,3000多年前,居住在邠(今陕西省郴州市、旬邑县西南一带)的姬姓部落,在首领公亶父的率领下,举族迁徙到“岐下”,他们将这片肥沃的土地称为“周原”。周人在这里积蓄力量,最终覆灭了商朝。

种建荣介绍,周代与商代文明路径迥异。商代以武力征服四方,周代则秉持“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理念。“文化、民族、体制的认可,就是在这个时候奠定的。”种建荣说。

找到传说中的“周人圣地”,成为几代周原考古人的共同使命。20世纪40年代,考古学家石璋如根据文献记载的大致位置展开田野调查,由此揭开了周原考古的序幕。2003年,周原李家西周铸铜作坊遗址出土了数以千计的西周陶范,让周原遗址首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5年,考古队整合多年成果,包括凤雏建筑群等重要发现,以及系统揭示的周原水网体系,让周原遗址再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然而,一个关键问题始终萦绕在周原考古人心中。“都邑,肯定要有城嘛。”种建荣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找城都是我们念兹在兹的使命。”

2020年,考古队在分析王家沟水网区域航拍影像时,发现了重要线索:周原地势北高南低,水系多呈南北走向,而王家沟一条支流却呈现出异常的东西向直角转折。他们对图纸实地勘测,发现北边还有一条平行的水渠,与直角部分形成一个方正的区域。一个想法随即在种建荣脑海中闪过——这会不会是环绕在城外的城壕?

“如果这是城壕,里面肯定有墙!”种建荣带领队员们继续寻找,终于发现一座“小城”。考古队循着“小城”城墙的方向向外探查,发现西墙和北墙都有向外延伸的迹象。经过勘探,一座规模更大的外城逐渐显现,这就是后来确认的“大城”。

在对“小城”内部进行精细勘探时,考古队又发现了一道东西向的墙和两道南北向的墙,在“小城”北部围合成方形。他们将这座新发现的“小小城”称为“宫城”。至此,周原遗址“宫城—小城—大城”的三重城垣结构完整呈现。凭借这一发现,“周原遗址”在今年年初再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圆了几代周原考古人的梦!”



种(chóng)建荣,1972年生,陕西渭南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考古博物馆)党委书记、院(馆)长,陕西省考古学会会长。他先后主持或参与周原、周公庙、清涧辛庄、澄城刘家洼遗址等考古项目30余项,其中5项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主持完成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5项。

种建荣说。

破局:“考古学主要讲证据链,当许多线索指向同一个地方,就可以达成共识了”

提到和周原结缘,种建荣说:“我小时候想当警察,大学期间阴差阳错被调剂到历史系,那时心里不太乐意。”1996年9月,种建荣毕业后进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办公室从事文书工作。有一次去考古工地现场,他发现考古有点像破案——根据发掘到的零散信息,对照文献寻找答案,推理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他瞬间来了兴趣,不久便主动申请加入考古队。

2002年,种建荣加入周原考古队。他回忆,世纪之交,尽管周原考古积累了一定成果,却缺少能够证明这里是文献记载中公亶父所迁“周原”的决定性证据。一名考古队员坦言:“很多学者认为这里不是文献记载中的都城,而是某个异姓贵族的家族采邑。”考古队内部也出现了质疑的声音——“发掘了几十年,这里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周原?”

面对周原性质难以判定的困局,考古队决定到田野间找答案。从研究角度看,需要关注的应该是这附近的同时期遗址。综合判断后,考古队觉得周公庙符合条件。自2004年起,周原考古队重点开展周公庙遗址的考古发掘。考古证实,周公庙遗址正是周公家族的采邑所在,但规模远不及周原。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他的家族采邑规模应该很大,或者说仅次于“都城”。如果周公庙规模远不及周原,那周原很大可能就是“都城”。这一发现重新坚定了考古队对周原的信心,中断多年后,他们再次将目光投向周原。

“重返周原”后,周原考古工作迎来了全新局面。团队将遗址视为一个有机整体,系统研究聚落结构和功能分区,还结合手工业考古和实验室考古成果,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统。

多年积累终于在2020年迎来重大突破。自这年起,周原南部区域陆续发现了一批战国至汉代的墓葬,出土了多件刻有“美阳”“美亭”字样的陶器。《汉书·地理志》记载:“美阳,《禹贡》岐山在西北。中水王,周太王所邑。”也就是说,当年公亶父所迁之地,可能就在汉代的阳美县。因为陶质的东西,在当时不会经过太远距离的运输。此次出土陶器上的“美阳”字样,或许能成为“周原即汉代美阳”的有力佐证。

更直接的证据出现在王家嘴区域的发掘中。2020年至2022年,考古队在这里发掘出一座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的夯土建筑基址,这是目前所见先周时期最大的宫殿建筑遗存,这个周人曾经修建的高等级建筑,为“周原遗址”就是古公亶父迁岐之地提供了关键证据。种建荣说:“考古学主要讲证据



周原遗址发掘现场。

链,当许多线索指向同一个地方,就可以达成共识了。”

接续:“一寸一寸丈量,一寸一寸发现,这是我们共同的坚持”

“如果从石璋如先生算起,到我这里,应该都算四代或四代半周原考古人了。”种建荣说。如今,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家单位联合组建新的考古团队,正在接力发掘。“我们住在一块儿,一起发掘,共享成果。”青年考古队员闫永强说。

目前,团队成员的年龄大多在二三十岁,除正式队员外,团队还吸引了很多研究生前来实习。

别看这些年轻人爱闹爱笑,工作起来个个都很认真。刚挖出一座墓葬,正在记录人骨形状的王昱霖,是刚毕业的95后女生;在实验室专注做植物遗存鉴定的周辉也是女生,去年硕士毕业来到这里。当被问及男生是否有室内室外的分工时,他们回答:“虽然各有分工,但都要参与田野发掘。”周辉说:“野外的环境虽然辛苦,但那种发现历史遗存的震撼,用任何语言都难以形容。”去年入职的闫永强,今年“五一”假期刚结婚,婚后很快就回到了考古基地。他说:“媳妇儿支持我工作,也理解我。”

面对这些年轻队员,种建荣很欣慰。他说,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告诉他们的,那就是:“一寸一寸丈量,一寸一寸发现,这是我们共同的坚持。”

烈日炎炎,接受完采访后,考古队员又拿上手铲,戴上草帽,前往各自的探方。



周原遗址出土的甲骨。

追根溯源话“赳赳”

郭发红

进入春秋时代,秦襄公即即立国,司马迁赞曰“秦起襄公”。秦人在大一统的过程中,于公元前688年设立了郿县,故址在今甘肃天水市籍端。次年秦武公扩土东进,在今陕西咸阳一带“初县杜郿”,不久又迁徙部分郿戎移民于今临渭区渭河以北,再设郿县,此即下郿,原设的天水郿县遂称上郿。公元前623年,秦穆公统一西戎,成为“西方诸侯之伯”。秦穆公还把东绕西周镐京的兹水改名为“霸水”(即今灞河),彰显自己称霸之功,又期冀后人继往开来。老秦人一如渭水东流,浩浩荡荡。

史学家左丘明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记载,孔子曾崇敬的一位神人——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当季札听到《秦风》诗歌后,不住评价说:“此之谓夏声。夫能夏礼,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大意是昂扬的秦声自西边飘来,秦之所以大气磅礴,不仅因其地域辽阔,更因其历史悠久,秦人侠肝义胆,曾辅佐于周朝。或者说,《秦风》沿袭了周朝风尚,方显得浩浩气存。但纵观《秦风》,确有“赳赳”之词。再查《诗经》,“赳赳”出现在《诗经·周南·兔置(jū)》中。“周南”是《诗经》十五国风的第一部分,属东都洛阳或由周公旦具体管辖范围内的民风民谣。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太史公留滞周南”,即言其父司马谈因病不能随汉武帝去泰山,而于洛阳之地停留下来。

《周南·兔置》诗为: 肃肃兔置,椹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肃肃兔置,施于中庭。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肃肃兔置,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该诗通过娴熟的狩猎活动,赞美“赳赳武夫”的忠诚和勇武。公侯,按周封列国爵位公、侯、伯、子、男之称谓,应为贵族大员,泛指领导人。武夫即公侯麾下的忠勇卫士,或叫羽林之士,再扩大点,就是保家卫国的士兵。赳赳,形容忠勇卫士的精神或气概,言其威武雄壮,雷厉风行。干城即如干如城,干指盾牌,城是城墙,言守卫屏障之牢靠。好仇即“好逑”,意即好的伙伴,如影随形。腹心即心腹,自己人,凡事尽心可委。一言以蔽之,赳赳的战士,保家卫国,其志胆忠心,日月可鉴。

如此说来,孙皓晖先生既取《周南·兔置》的“赳赳”之词,又融合《秦风·无衣》之意,在《大秦帝国》中将“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设定为老秦民谣,而且是立志之言。这与历史发展及后人对秦人的评价相吻合。《商君书》言秦因“据乱世”而“尚力”,强调“农战”与“法治”。《史记·商君列传》有:“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班固在《汉书·赵充国卒庆忌传》中说,秦地“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偕。’其风气势俗自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

宋儒朱熹《诗集传》评价《秦风·无衣》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

电视剧《大秦帝国之裂变》中,插曲有《赳赳战歌》,也称《老秦人古歌》。其实“赳赳战歌”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中已有应用:“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战歌激励着无数英雄儿女保家卫国,又有多少“最可爱的人”长眠异国他乡。2019年1月,该战歌词作者、原第二炮兵部队基地政治部主任麻扶摇去世,他在世时一再谦虚地说,他不懂词曲,他只是将战士们的请战书、发言稿中的话整理了一下,再经《人民日报》和作曲家周巍峙修改,才成就了这首战歌。

回顾80年前,三秦军民为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当时陕西共有935万人,应征入伍的有115万余人,基本上是八人中就有一人奔赴战场。陕西还为抗战贡献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是名副其实的抗战大后方。“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曾担任陕西省省长的赵寿山(1894-1965年,今西安市鄠邑区人)义愤填膺,立即请缨抗战,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第一个请战者。1937年7月21日,赵寿山率13000多名陕军将士在三原誓师,他慷慨陈词:“抗日若怕死,何必出潼关!不灭火寇,誓不生还……”1937年10月,赵寿山率全副官兵扼守山西娘子关正面阵地,浴血奋战13昼夜。赵寿山诗云:“妖气弥漫寇方张,百战何辞作国殇。士卒冲锋杀敌处,娘子关外月如霜。”1938年6月,赵寿山任三十八军军长,奉命守卫陕西最重要的防线——中条山。之后,赵寿山率陕军将士死守中条山两年零四个月,粉碎了日寇11次“扫荡”,卫立煌将军称他为“中条山的铁柱子”。

其间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1939年6月6日的“六六战役”。时日军集结3万余兵力,分九路突袭。我军共2.6万人实施阻击。激战十余日,最终击退日军。“八百陕西冷娃跳黄河”的事件就发生在这次战役中。2008年,由陕西省剧坛姐妹花谢迎春、谢艳春担任编剧,西安易俗社精心打造的秦腔现代戏《柳河湾的新娘》,剧本背景正有“八百陕西冷娃跳黄河”这一抗战事件。2010年,“中条山抗日英雄跳黄河殉国纪念碑”在山西芮城县圣天湖畔落成。遗憾的是1940年10月后,赵寿山率领的这批赳赳秦兵奉命撤出了中条山,而1941年发生的中条山会战,反成了国民政府军“抗战史中最大的耻辱”。会战变成了大溃败,这让赵寿山对国民党的顽瘴痼疾看得更透,他把希望的曙光再次投向了圣地延安。1942年冬,赵寿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名爱国志士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无论风起云涌,还是风轻云淡,“赳赳老秦”“赳赳大秦”铸就的华夏文明,彰显民族血性,这是我们的魂魄,是我们的根文脉。

胡心雅